



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武 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

家犬是我国最早被驯化成功的动物,其在先秦时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文献资料对家犬在先秦时期的作用有详细的记载,如《周礼·秋官·犬人》记载:“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畿、珥、沈、辜,用騶可也。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贾公彦疏曰:“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德公)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另外,在先秦时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用家犬随葬的现象。由上可知,家犬在先秦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有狩猎、看家、食用、祭祀和随葬。鉴于家犬在先秦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对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对今后的家犬研究进行展望。

一、研究现状

关于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历史学等。家犬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 关于家犬的判断标准

关于家犬的判断标准,已有研究多是从骨骼形态角度进行分析。该方面的研究始于杨钟健,他认为家犬的头和切牙较小,头的顶部凸起。之后,众多学者对家犬与狼的骨骼形态差异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家犬的头骨、下颌骨和犬齿比狼小,吻部也比狼短,前臼齿排列较紧密,下颌骨底缘呈弧形, P^4 的长度不大于 (M^1+M^2) 的长度,狼的下颌骨底缘较平直, P^4 的长度大于 (M^1+M^2) 的长度。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绝大多数研究是学者们在动物骨骼的鉴定报告中对狼与家犬骨骼形态差异的简单描述,并没有做专门研究。

除上述研究外,武仙竹根据我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狼和家犬的牙齿测量数据,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见表一。该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家犬骨骼判断标准的专门研究。

除了骨骼形态角度外,一些学者还根据考古学现象(例如家犬啃咬痕迹、家犬粪便的出现)以及测量数据的比较来判断遗址中家犬是否出现。另外,极少数研究者还以家犬的驯化年代作为判断依据,认为晚于家犬驯化年代的应属于家犬。

由上可见,相对于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家犬判断标准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早,但是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一,已有的家犬骨骼判断标准比较零散,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突破,也鲜有方法论上的总结,专门研究还较少。第二,最近,袁靖提出了家养动物判断的系列标准^①,但在家犬判断方面,研究者运用的判断标准多局限于骨骼形态学观察或考古学现象,而忽略了在年龄结构、病理现象等方面的探索,家犬判断系列标准尚未建立。

(二) 关于中国家犬的起源与驯化

家犬的起源与驯化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根据先秦时期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状况,下文分两个阶段对其进行总结。

(1) 第一阶段 20世纪70至90年代

我国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始于1977年。斯坦利 J. 奥尔森和约翰 W. 奥尔森认为灰狼的一个亚种——蒙古狼(*Canis lupus chanco*)或称中国狼或亚洲狼可能是中国和蒙古早期家犬的祖先^②。之后,他们又通过分析周口店第一、第三和第十三地点出土的变异狼,认为其可能是从驯化的野生狼导

表一 狼、狗裂齿与臼齿测量数据的变量规律

(根据武仙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研究》一文制表)

比较项	比较值	狼	狗
P ⁴ 长度减去(M ¹ +M ²)长度	变量值	正数	负数
	变异范围	0.2~1.8 毫米	-0.2~-2.6 毫米
	平均值	1.02 毫米	-1.18 毫米
P ⁴ 长度减去 M ¹ 长度	变量值	较大	较小
	变异范围	7.6~11.2 毫米	4.2~7.6 毫米
	平均值	8.92 毫米	5.68 毫米
M ₁ 长度减去(M ₂ +M ₃)长度	变量值	较大	较小
	变异范围	10.1~11.8 毫米	6.8~7.9 毫米
	平均值	10.6 毫米	7.44 毫米
M ₁ 长度减去 M ₂ 长度	变量值	较大	较小
	变异范围	15.1~17.6 毫米	9.5~12.7 毫米
	平均值	16.28 毫米	11.43 毫米

致家畜狗出现的一种祖先类型^⑬。除奥尔森外,其他学者也对家犬的祖先进行了分析。黄象洪等认为“狗可能是由一种似狼的野狗驯化而来。”^⑭李峰根据地理分布、生态习性、交配繁殖等方面因素,认为家狗是由狼和豺演变而来的^⑮。田名部雄一等认为家犬的祖先是“生息在印度或叙利亚地区的较小型的狼,通过这种狼与各地不同种狼的杂交混血而产生最早的犬。”^⑯谢成侠认为家犬起源于原始的野犬和狼(*C. lupus*)、豺(*C. aureus*)有密切的关系^⑰。卫斯认为“狗的祖宗在北方是狼,在南方除了狼外,还有几种豺,狗是它们杂交的后裔。”^⑱

在该阶段,除了研究家犬祖先外,一些学者还对家犬起源时间、驯化方式和动因进行了分析。关于起源时间,黄象洪等认为家犬起始于中石器时代^⑲。周长生根据最早的家犬化石的出现时间,认为家犬在中国的驯化时间为距今约 6500~7000 年。关于驯化方式,周长生通过分析甲骨文中的“犬”字,认为“狗是用绳束或加桎来驯服的。”^⑳谢成侠认为“原始人类已与狼或豺逐渐接近,往往把吃剩的食物遗弃在住处附近,引诱狼、豺来觅食。久而久之,它们就不怕人了;也可能把狼禁锢起来,使其有所驯服,或将狼仔从小培养起来,使之逐渐失去兽性,一直到与人亲近。”^㉑关于驯化动因,Juliet Clutton-Brock 认为“武器的变化与狩猎方法相联系,这最终导致了犬作为猎人的合作者而被驯化。”^㉒王利华也持上述观点,认为人类驯养家犬的最初动

机是猎用^㉓。田名部雄一等认为“狼与人在长期的生存利益中产生的依赖关系,促成了狼向犬衍变的家畜化。”^㉔

总体而言,从 20 世纪 70 到 90 年代,学者们多是围绕着家犬的祖先进行研究,少数研究涉及到家犬的起源时间、驯化方式和动因。

(2) 第二阶段 21 世纪初至今

到了 21 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家犬起源与驯化研究中的运用,该方面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张亚平等通过系统研究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地区的 654 只狗和 38 只欧亚大陆狼的遗传变异,认为狗起源于东亚,之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㉕。之后,罗理杨通过研究中国 15 个省区的 463 个土狗样品,认为世界的家犬起源于以泰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部分、东南亚的岛屿,以及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中心的部分省份(包括: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和海南);参加家犬建群的数量为 7 个母系,家犬的建群时间约为 4 万年^㉖。庞峻峰等通过对家犬线粒体全序列的分析,认为现代狗起源于东亚,我国可能是现代狗的起源地,其起源时间约为更新世晚期。之后又通过分析线粒体 DNA 全序列构建的世系树,认为家犬的驯化至少涉及了 9 个母系创群世系,中国长江以南及东南亚区域是家犬驯化的主要区域^㉗。2011 年,张亚平等又对世界范围内的 151 只家犬的 14437 个 Y 染色体碱基对进行了系统的 DNA 序列分析,认为长江以南地区是主要的,并且很可能是唯一的家犬驯化中心^㉘。该研究首次基于父系遗传证据证明了现代家犬起源于东亚南部,支持了线粒体母系遗传的研究结果。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初步确定了世界范围内家犬起源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但家犬的祖先有多少个建群者,以及准确的起源时间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除上述研究外,另一些学者也对家犬起源时间、地点以及家犬祖先、驯化动因进行了探讨。关于起源时间,武仙竹根据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研究,认为中国家犬应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初期或旧石器时代^㉙。黄蕴平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狩猎者将狼驯化成了狗^㉚。袁靖通过比较

距今 10000 年左右的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家犬和现生狼的下颌骨的齿列长度,认为南庄头遗址出土的家犬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家犬,其齿列与狼的相比已经明显缩短,“中国狗的家养历史不应该停留在南庄头遗址这个时间段里,还可能向前追溯。”^⑳关于起源地点,居龙和根据考古和岩画资料,认为“东北和蒙古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家犬驯化中心。”^㉑关于家犬祖先和驯化动因,翁屹等认为“狗首先由亚洲和欧洲的狼驯化而来的可能性较大。”^㉒游修龄认为“小型中国狼是早期中国犬的祖先。”“其狩猎方面的特征可能与犬被人类驯化有关。”^㉓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藏獒进行了研究。张慧斌等认为藏獒是由汤氏熊(托玛克塔斯 Tomarctus)直接演化而来的一个最古老的犬种^㉔。孙源荣通过研究犬化石,认为远古时代的巨鬣犬很可能是藏獒的祖先^㉕。李隐侠等通过对藏獒、家犬亚种内 6 个大型家犬品种的系统发育分析,认为“藏獒与其他家犬品种一样,也起源于灰狼。”^㉖并且,其起源时间早于家犬,是家犬亚种中的一个品种^㉗。

由上可见,该阶段的研究多是围绕着家犬的起源时间和地点进行,少数研究涉及到了家犬的祖先与驯化动因。

综上所述,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学者们主要是从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围绕着家犬的祖先、起源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研究。关于家犬驯化的动因、方式和背景则很少涉及,或仅是对其进行了推测。显然,对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 关于家犬饲养

关于中国家犬的饲养状况,下文主要从养犬、家犬的体型和形态变化、家犬的食性、相犬术与狂犬病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关于养犬

张震通过梳理考古资料,对新石器时代的家犬饲养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家犬饲养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成熟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㉘。卫斯通过梳理甲骨文中的相关资料,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探讨了商代养狗业的状况,认为商代养狗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养狗业最兴盛的时代^㉙。另外,文传良通过梳理考古与文献资料,也对殷商时期的养犬状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㉚。

(2) 关于家犬的体型和形态变化

关于家犬体型,Nobuo Shigehara 等通过分析下王岗、客省庄和上孙家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认为在遗址所属时期内,中国家犬的形态有很大的变化,至少代表了三个品种,其中客省庄遗址出土家犬的体型属于中型到大型之间^㉛。苏光圣对台湾南关里东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遗址出土的多数家犬属于中小型^㉜。杨梦菲等对殷墟花园庄东地 M54 与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比较,认为 M54 出土的家犬的体型整体稍大,前掌大墓地的家犬的体型整体较小^㉝。杨杰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家犬的体型进行了分析,认为从二里头遗址二期到二里冈上层家犬的体型大小没有变化^㉞。关于家犬体型不同的原因,谢成侠认为这是原始人豢养的犬与狼(主要在北方)或豺(主要在南方)杂交的结果^㉟。

关于家犬的形态变化,祁国琴通过比较磁山、半坡、姜寨、下王岗、河姆渡、昙石山和殷墟遗址出土家犬的测量数据,认为“无论是华北还是华南一些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的狗,其体型大小似乎都差不多。”^㊱袁靖通过比较贾湖、磁山、半坡、姜寨、朱开沟、下王岗、圩墩、万北、河姆渡和昙石山遗址出土家犬的测量数据,认为“不管是中国的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属于家畜起源阶段的狗要大于家畜成熟阶段的狗。”^㊲胡松梅通过比较杨界沙遗址出土家犬和现生狼的测量数据,认为“狗的驯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逐渐变小的,在头骨整体较快变小的同时,单个牙齿性状相对变化较小,但牙齿的间隙越来越紧凑。”^㊳黄蕴平通过分析跨湖桥和曲村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认为“在中国长达 5000 年的驯化过程中,狗的形态特征和体型大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下裂(M1)变窄。”^㊴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仅是对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的少数遗址的研究,而非对全部遗址的整体研究,所以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 关于家犬的食性

通过分析家犬的食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饲养家犬的策略。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秦安大地湾^㊵、五庄果梁^㊶、陶寺^㊷、安阳鄆邓^㊸、临潼康家和灵宝西坡^㊹遗址以及双塔遗址一期^㊺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研究结构显示,双塔遗址一期家犬的植物类食物主要是 C₃ 类植物;五庄果梁、陶寺、鄆邓、康家、西坡遗址以及大地湾遗址二期家犬的植物类食物

主要是 C4 类植物,表明了其与先民从事的粟作农业有关。五庄果梁、陶寺、康家遗址以及双塔遗址一期家犬表现出杂食性和肉食性特征,表明其食物结构受到了先民活动的影响。

(4) 关于相犬术与狂犬病

相犬术和人们对狂犬病的认识,也间接地反映了古代家犬的饲养水平,一些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陈方良等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相犬术就已经出现了^⑤。文凯等认为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对狂犬病就有了足够的认识^⑥。

综上所述,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家犬饲养状况,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如:先秦时期各个地区的家犬饲养状况如何?先秦时期家犬的体型是否具有时空差异?先秦时期家犬的饲养方式和规模如何?总之,如何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来分析先秦时期各地区家犬的饲养状况还需进一步探讨。

(四) 关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中国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家犬骨骼埋藏现象,它们多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有关,如用来祭祀和随葬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下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1) 史前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史前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学者们主要关注于犬牲的时空分布、功能和习俗渊源等。高广仁认为史前时期以犬为牲的现象集中发现于大汶口—龙山文化之中,犬牲主要用于“墓葬殉葬,作为供墓主驱使的牲牺,或担任墓主的守卫。”^⑦张震对贾湖遗址殉葬的完整家犬的功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家犬是为了“护卫村寨,或护卫象征村庄的墓地。”^⑧郭志委主要对史前时期墓葬殉犬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墓葬殉犬出现的早期,墓主与殉犬的关系比较密切,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时代,殉犬承担起为墓主服务的功能,淮河、汉水中上游地区可能是我国早期犬牲文化的起源地^⑨。

(2) 二里头文化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李维明认为,“二里头文化发现有整只狗单独埋藏坑,或葬于墓内腰坑、漆匣内,或作为建筑的奠基。这种现象表明,狗往往被作为一种灵牲用于各种宗教祭祀活动。”^⑩

(3) 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学者们的研究较

多,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着殉犬习俗的渊源和发展、殉犬的功用及其他等三个方面。

1. 关于殉犬习俗的渊源和发展

关于商代殉犬习俗的渊源,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代殉犬习俗是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该观点的代表人物高广仁认为,商代以犬为牲的文化因素不是来自先商本土的传统,而是吸收了东方海岱地区(也有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⑪。郜向平对腰坑殉犬进行了分析,认为腰坑殉犬习俗是在吸取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加以创造的结果^⑫。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代殉犬习俗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产物。该观点的代表人物刘丁辉认为,“商代殉犬习俗并不是直接吸收或借鉴了前期或同期的其他文化类型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的,而是商代本身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文化习俗,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产物。”^⑬关于商代殉犬习俗的发展过程,李志鹏认为中原地区的殉犬习俗始于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从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开始,墓中殉犬的习俗逐渐遍布商文化和商文化影响区,到了晚商时期,殉犬习俗变得更加流行^⑭。

2. 关于殉犬的功用

关于殉犬的功用,众多学者进行了探讨。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是警卫作用,即殉犬是为了保卫墓主人、守卫墓门,或是为墓主人把守黄泉路入口或阴阳两界通道。黄展岳认为商代墓中的殉犬“在于司警卫。”^⑮唐云明^⑯、赵芝荃^⑰、杨华^⑱也持上述看法。而郭宝钧认为腰坑中的殉犬是为了保卫墓主人,而墓道中的殉犬是守门的^⑲。岳洪彬通过分析殷墟多年来发掘的墓葬和水井资料,对铜铃上装饰的倒装兽面纹进行了探讨,认为“腰坑中的殉犬似乎是为死者把守黄泉路入口,而填土中的殉犬则好似为死者把守阴阳两界通道的守护者。”^⑳

第二种是陪伴作用,即殉犬是为了陪伴墓主人。许进雄认为因为家犬是人们的玩伴宠物,所以“商代稍为大型的墓葬,犬常被埋于尸体下的腰坑,以便永久陪伴主人于地下。”^㉑

第三种是宁(序)四方、正方位作用。王志友认为“殷代腰坑殉犬,与狗用在房屋正位、奠基、安宅时所起宁(序)四方、正方位的作用大概有关,是商代人们宗教信仰的一个反映。”^㉒

第四种是驱邪作用,即殉犬是为了宁风、防御

蛊毒。井上聪认为在墓中殉狗与人们认为蛊毒来自地下的观念有关,在墓主腰部位置葬狗,可以“起到防御四方恶风、恶魔侵略的效果。”^⑤

除上述四种观点外,刘丁辉认为殉狗在不同的形式和场合下具有不同的目的,总的来说主要有守卫、驱邪、奠基和祭祀献享等,另外,墓葬中的殉狗,还有可能作为墓主人的宠物而殉葬^⑥。

3. 其他方面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一些学者还对腰坑殉犬进行了重点分析,对祭祀坑中的犬牲数量进行了统计、对甲骨文中的犬牲资料进行了汇总、对商墓中的犬牲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

关于腰坑殉犬,郝向平对腰坑内殉犬的头向进行了分析,认为“与前几个阶段相比,晚商腰坑中殉犬的头向有了截然相反的安排,这反映了人们在丧葬观念上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转变。”^⑦郭志委对先秦时期不同阶段腰坑内殉犬的数量及比例、殉犬头向与墓主头向的关系均进行了统计^⑧。

关于祭祀坑中的犬牲,谢肃认为商文化祭祀坑中的“犬牲数量在334只以上,数量仅次于人牲,为动物之首。”^⑨

关于甲骨文中的犬牲,张秉权根据用犬数量的多少,总结了祭祀卜辞中的用犬资料^⑩。凌纯声对卜辞中的犬祭进行了总结,认为犬祭的对象有祭风、祭风师、祭四方、祭日,犬祭用牲之法有:宁犬、巫犬、燎犬、埋犬和宜犬^⑪。杨杨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中祭祀犬牲的分析,探讨了犬牲的献祭对象,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犬牲主要用来献祭于在商人精神信仰领域具有崇高地位的‘四方神’,以及时王父辈、诸母、兄辈等关系较近的亲族。少数情况下,用于祭祀岳、洹等自然神。”^⑫

关于商代犬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李志鹏通过分析殷墟晚商墓葬中犬牲的年龄结构,研究了犬牲的来源问题。他认为“商代晚期以犬殉葬之风的盛行可能导致专门提供丧葬礼仪所需犬牲的专业化的养狗业应需产生,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墓葬中的狗牲,可能是从专门的养狗户那里买来。”^⑬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的研究较多,但是对商代犬牲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较少。如何更好地利用商代墓葬中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来深化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值得探讨。

(4) 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研究成果不多,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西周墓葬犬牲的研究,韩巍对腰坑殉犬及墓中殉犬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关于腰坑殉犬,他认为该葬俗主要流行于殷遗民和东方族系方国中,以姬姓为主体的周人很少采用。西周中期,该葬俗在多数地区有逐渐衰落的趋势,而周人统治的加强、周礼的推行和殷遗民实力的削弱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关于墓中殉犬的性质,他认为腰坑殉犬带有奠基祭礼的意味,填土中的殉犬可能与封闭墓穴的某种祭仪有关,二层台上的殉犬与其他随葬品的性质相同^⑭。

关于西周墓葬殉犬习俗的渊源,李志鹏认为西周时期“墓葬随葬狗牲的现象与殷遗民与殷商文化的葬俗的遗风影响当有很大的关系。”^⑮

关于犬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宋艳波对滕州前掌大、长清仙人台和新泰周家庄遗址出土犬牲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个遗址中“狗的死亡年龄有明显集中的现象,说明先民们会有意识的选择一定年龄段的狗来殉葬,可能会根据性别、个人喜好等不同的方面选择一些未成年的狗来殉葬。”^⑯

除上述研究外,王子今对秦德公“磔狗邑四门”的宗教文化意义进行了分析,其认为“磔狗邑四门”可能是秦德公“初居雍经历第一个夏季‘襪却热毒气’的措施。”^⑰

总体而言,关于周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研究不多,目前学术界对西周墓葬殉犬习俗的渊源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多是通过梳理考古资料或文献资料来分析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而对史前时期和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关注的较少,尤其是对先秦时期的犬牲进行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较少。目前,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随葬犬牲的来源及年龄如何?人们如何选择犬牲?犬牲在动物牺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历时性变化如何?总之,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全面收集犬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类以辨析其含义,并梳理时空分布及发展过程。

(五) 其他研究

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除上述四个方面外,一些学者还对家犬的古DNA、家犬艺术品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进行了研究。

(1) 关于家犬的古DNA研究

袁靖等对距今3000多年前的内蒙古大甸子遗

址和河南花园庄遗址出土家犬骨骼的 13 个样品进行了遗传基因分析,之后将 13 个样品的遗传因子序列与日本经过系统分类的 28 个类型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一些样品的遗传因子序列与日本属于鄂霍茨克文化(公元 5 世纪左右)和中世纪(公元 13~16 世纪)的遗址出土的家犬的遗传因子序列相同,进而从时间顺序上科学地证明了日本一些家犬的祖先在中国^⑧。

(2) 关于家犬艺术品

王劲对石家河文化出土的陶犬进行了观察,将其分为大头短吻胖体和小瘦头长吻瘦体两型。通过结合邓家湾文化时期的宗教遗存,认为陶犬可能是“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⑨

(3) 关于家犬死亡年龄的判断方法

目前,学术界主要根据家犬的牙齿萌出和骨骺愈合状况来判断其死亡年龄^⑩。然而,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家犬在 7 个月时,恒齿全部萌出,在 1.5 岁左右时,各个骨骼部位的骨骺全部愈合,所以对于年龄大于 1.5 岁的家犬,该方法并不适用。然而,牙齿的磨蚀程度可以为成年家犬的相对年龄提供判断依据。苏光圣根据 M1 的磨蚀情况,对台湾南关里东遗址出土家犬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该遗址中“未成年和刚成年的狗死亡率较低,成年后中一壮年狗死亡率最高。”^⑪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对于 M1 磨蚀标准的划分缺乏依据,但他的研究是家犬死亡年龄判断方法的一次新的尝试,对家犬年龄结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二、研究展望

通过上文对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现状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先秦时期的家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家犬研究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我们还需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工作还应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关于家犬判断系列标准的建立。已有的家犬判断标准多注重于骨骼形态观察和考古学现象两个方面,因此,今后还应在家犬的年龄结构、病理现象、食性分析和古 DNA 研究等方面加强研究,进而建立家犬判断的系列标准。

第二,关于家犬的起源与驯化。目前,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分析、整合已有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中国的考古资料,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家犬的起源与驯化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将南庄头遗址的家犬遗存与华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狼遗存进行比较,观察两者的形态差异,确定早期阶段家犬的形态特征。二是对新石器时代中期各个地区的家犬遗存进行横向比较,探讨该时期内不同地区的家犬形态是否具有地区差异,加深对该时期我国家犬形态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我国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提供动物考古学证据。

第三,关于家犬的饲养。今后需要对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分析先秦时期各个地区家犬的饲养状况。在家犬体型和形态变化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借鉴日本学者 Hasebe K.的家犬体型分类标准^⑫,对各个遗址中的家犬进行体型分析。其次,对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遗址中同一体型范围内的家犬的形态变化进行分析,以探究不同时空框架下同一体型范围内的家犬形态是否具有历时性或区域性变化。

第四,关于家犬的食性研究。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仅是对个别遗址的个案研究,学术界还尚未对家犬的食性做过系统研究。因此,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对驯化早期阶段家犬的研究,以探究该阶段家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将其与先民们的食性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了解先民的家犬饲养策略,从一个侧面探索家犬与人类关系的建立。另外,还需要对重点遗址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可以对同一遗址不同时期的家犬进行食性分析,以探讨在该遗址所属时期内家犬的饲养策略是否具有历时性变化,进而从一个侧面探究该遗址的社会发展状况。

第五,关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我们还需要做的有以下四点:一、在全面搜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史前时期犬牲的时空分布,辨析不同埋藏地点的犬牲含义,探究史前时期犬牲习俗的发展过程。二、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商代墓葬中不同位置犬牲的功用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商人的宗教信仰状况。三、全面搜集周代犬牲的考古学资料,探究周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渊源及其与商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关系。四、对先秦时期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例如,分析墓葬殉犬的死亡年龄,探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等级的墓葬中的犬牲是否具有年龄结构差异,进而探讨商人对犬牲的选择方法。

第六,关于家犬死亡年龄的判断方法。法国学者 Marie-Pierre Horard-Herbin 对根据 M1 磨蚀状况判断家犬死亡年龄的方法做了很好的介绍^⑩,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他的方法进行相关的研究。另外,鉴于我国先秦时期(尤其是商代)出土了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我们可以从中搜集保存较好的整犬骨骼遗存,建立骨骺愈合状况与 M1 磨蚀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结语

本文主要对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者们在家犬判断标准、家犬起源与驯化、家犬饲养、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家犬古 DNA 研究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些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今后还应在家犬判断系列标准、家犬体型与形态变化、家犬食性和死亡年龄判断方面加强研究,还需要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以及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李志鹏博士、吕鹏博士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下),第 1392~139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汉)司马迁撰:《史记》(第 4 册),第 1360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a. 郭志委:《试论史前时期墓葬殉犬习俗》,《文物》2012 年第 8 期。b. 刘丁辉:《商代殉狗习俗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杨钟健、德日进:《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第 2 页,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印行,1936 年。

a.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 年第 4 期。b. 黄象洪、曹克清:《常州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狗的头颅骨标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 年第 2 期。c. 祁国琴:《福建闽侯县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兽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年第 4 期。d. 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e. 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 43~51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f. 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

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 年第 3 期。g. 贾兰坡、张振标:《河南浙川下王冈遗址中的动物群》,《浙川下王冈》,第 429~439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h. 韩立刚:《湖北省黄梅县塞墩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文物研究》(总第 9 辑),第 31~56 页,科学出版社,1994 年。i. 黄蕴平:《动物遗骸鉴定报告》,《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下),第 557~565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j. 孔庆生:《前埠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动物遗骸》,《山东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第 103~105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k. 武仙竹:《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秭归柳林溪》,第 268~292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l. 武仙竹、卢德佩:《卜庄河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秭归卜庄河》,第 836~878 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m. 张镇洪:《巴东黎家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 60~63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n. 胡松梅、孙周勇:《陕北靖边五庄果梁动物遗存及古环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05 年第 6 期。o. 陈全家:《白金宝遗址(1986 年)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04 年第 4 期。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 年第 3 期。p. 同号文、刘金毅:《狗年话犬》,《化石》2006 年第 1 期。q. 钟蓓:《济宁玉皇顶遗址中的动物遗骸》,《海岱考古》(第 3 辑),第 98~99 页,科学出版社,2010 年。

⑲ 武仙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研究》,《四川文物》2005 年第 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第 180~201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周本雄:《白家村遗址动物遗骸鉴定报告》,《临潼白家村》,第 123~126 页,巴蜀书社,1994 年。

⑮ 杨杰:《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第 470~539 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

赵静芳、袁东山:《玉溪遗址动物骨骼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2 年第 3 期。

⑪ a.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0 年第 2 期。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第 86~87 页,文物出版社,2012 年。

⑫ Olsen, S.J., Olsen, J.W. (1977). The Chinese wolf, ancestor of new world dogs. Science 197: 533~535.

⑬ 斯坦利 J. 奥尔森、约翰 W. 奥尔森、祁国琴:《周口店变异狼(Canis lupus variabilis)在家畜狗(Canis familiaris)祖先系列中的位置》,《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 年第 3 期。

⑭、⑰ 黄象洪、曹克清:《常州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狗的头颅骨标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 年第 2 期。

⑮ 李峰:《人类最完美的战利品——狗的起源及其

它》《化石》1980年第4期。

①⑥ 田名部雄一著,郑若葵译:《亚洲家犬系统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①⑦、②①、④⑥ 谢成侠:《中国犬种的起源与进化》,《科技文萃》1994年第1期。

①⑧、④⑩ 卫斯:《从甲骨文材料看商代的养狗业》《卫斯考古论文集》第97~10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⑩ 周长生、侯琳:《狗的起源及进化》,《大自然》1994年第4期。

②② I.L.Mason 主编,《驯养动物的进化》翻译组译:《驯养动物的进化》第222~23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③ 王利华:《早期中国社会的犬文化》,《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②④ 田名部雄一著,郑若葵译:《亚洲家犬系统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②⑤ Savolainen P, Zhang Y P, Luo J, et al. (2002). Genetic evidence for an east Asian origin of domestic dogs. *Science* 298:1610~1613.

②⑥ 罗理杨:《现代家犬的起源——线粒体 DNA 的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②⑦ a. 庞峻峰、邹晓菊、缪迎春、罗里扬、张亚平、Peter Savolainen、Joakim Lundeberg、Thomas Leitner:《东亚地区狗世系的系统发育关系:基于线粒体全序列的初步研究》,《中国的遗传学研究——中国遗传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第311~312页,2003年。b. 庞峻峰、邹晓菊、张亚平、Peter Savolainen、Joakim Lundeberg、Thomas Leitner:《家犬线粒体 DNA 的系统地理学差异》,《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集》,第92~93页,2004年。c. 邹晓菊、庞峻峰、Mattias Oskarsson、Peter Savolainen、Thomas Leitner、张亚平:《世界范围家犬线粒体 DNA 的系统地理学差异》,《中国遗传学会七届一次青年研讨会暨上海高校模式生物 E——研究院第一届模式生物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08页,2005年。

②⑧ a. Z-l Ding, M Oskarsson, A Ardalan, et al. (2012). Origins of domestic dog in Southern East Asia is supported by analysis of Y-chromosome DNA. *Heredity* 108(5):507~514. b. 马波:《基于父系遗传研究证据表明:家犬起源于东亚南部灰狼》,《科技日报》2011年12月25日,第001版。

③⑩、⑤⑩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第1~31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① a.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0年第2期。b. 袁靖、李君:《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③② 居龙和:《人类最忠实的伴侣动物——家犬》,《生物

学通报》2006年第1期。

③③ 翁屹、葛威、王昌燧:《家犬起源的 DNA 分子系统发育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第1期。

③④ 杜青林、孙政才总主编,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第256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③⑤ 张慧斌、张彬:《中国藏獒》,第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⑥ 孙源荣:《南京地区引入藏獒及几种国外犬的特质特性比较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③⑦ 李隐侠、李齐发、刘振山、赵兴波、潘增祥、孙源荣、徐银学、谢庄:《藏獒线粒体 DNA D-loop 区序列测定及其分类地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③⑧ 李隐侠:《藏獒的起源、系统发育与遗传多样性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⑨、④⑩ 张震:《漫谈中国古代的狗》,《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10日第007版。

④① a. 文传良:《殷商周秦时代犬史小考》,《中国养犬杂志》2000年第4期。b. 文传良:《殷商周秦时代犬史小考》,《四川畜牧兽医》2002年第4期。c. 文传良、文凯:《中国古代养犬史考》(上),《四川畜牧兽医》2003年第1期。

④② Nobuo Shigehara, Qi Guoqin, Hajime Komiya, Yuan Jing. (1998). Morpholog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dogs from three neolithic sit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8(1):11~22.

④③、④④ 苏光圣:《南关里东遗址陆地哺乳动物骨骼研究与生计策略探讨》,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

④⑤ 杨梦菲、袁靖:《M54 出土狗骨研究报告》,《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331~342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④⑥ 祁国琴:《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504~53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⑦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5期。

④⑧ 胡松梅、孙周勇、杨利平、康宁武、杨苗苗、李小强:《陕北横山杨界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④⑨ Barton, L., et al. (2009).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isotopic identity of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14): 5523~5528.

⑤② 管理、胡耀武、胡松梅、孙周勇、秦亚、王昌燧:《陕北靖边五庄果梁动物骨的 C 和 N 稳定同位素分析》,《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6期。

⑤③ 陈相龙、袁靖、胡耀武、何弩、王昌燧:《陶寺遗址家畜饲养策略初探:来自碳、氮稳定同位素的证据》,《考古》2012年第9期。

⑤4 a.侯亮亮、李素婷、胡耀武、侯彦峰、吕鹏、胡宝华、宋国定、王昌燧：《安阳鄆邓遗址先商文化动物骨骼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先商文化时期家畜饲养方式初探》，《安阳鄆邓遗址》，第 452~463 页，大象出版社，2012 年。b.侯亮亮、李素婷、胡耀武、侯彦峰、吕鹏、曹凌子、胡宝华、宋国定、王昌燧：《先商文化时期家畜饲养方式初探》，《华夏考古》2013 年第 2 期。

⑤5 Pechenkina, E. A., et al. (2005). Reconstructing northern Chinese Neolithic subsistence practices by isotopic analy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2: 1176~1189.

⑤6 张全超、汤卓炜、王立新、段天璟、张萌：《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 11 辑)，第 355~360 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⑤7 陈方良、木春：《中国古代相犬术简介》，《警犬》2004 年第 7 期。

⑤8 a.文传良、何以刚、文凯：《中国古代犬病史小考》，《中国畜牧兽医学学会 2003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小动物医学分册)，第 218 页，2003 年。b.文凯、文传良：《古代狂犬病史再考》，《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研究新成果汇编》，第 61~62 页，2004 年。

⑤9、⑥3 高广仁：《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第 291~303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⑥1 郭志委：《试论史前时期墓葬殉犬习俗》，《文物》2012 年第 8 期。

⑥2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动物资源的利用》，《中原文物》2004 年第 2 期。

⑥4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 274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⑥5、⑦6 刘丁辉：《商代殉狗习俗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⑥6、⑧3、⑧5 李志鹏：《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研究二题》，《南方文物》2011 年第 2 期。

⑥7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附论殉牲祭牲》，《考古》1983 年第 10 期。

⑥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 112 页，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⑥9 赵芝荃：《论夏、商文化的更替问题——为纪念二里头遗址发掘 40 周年而作》，《考古与文物》1999 年第 2 期。

⑦0 杨华：《论中国先秦时期腰坑墓葬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

⑦1 郭宝钧：《一九五零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 年第 5 册。

⑦2 岳洪彬：《谈商人的“黄泉观念”——从殷墟铜铃上装饰的倒装兽面纹说起》，《中国文物报》，2006 年 8 月 18 日，第 007 版。

⑦3 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

视》，第 69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年。

⑦4 王志友：《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

⑦5 a.(日)井上聪：《殷墓腰坑中的狗巫术——相克理论的起源与发展之一》，《先秦阴阳五行》，第 170~202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b.(日)井上聪：《殷墓腰坑与狗巫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5 期。

⑦7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 75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⑦8 郭志委：《先秦腰坑葬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⑦9 谢肃：《商代祭祀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

⑧0 张秉权：《祭祀卜辞中的牺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第 181~231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年。

⑧1 凌纯声：《古代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犬祭》，《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第 663~710 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年。

⑧2 杨杨：《浅析甲骨文中的犬牲》，《郑州师范教育》2013 年第 1 期。

⑧4 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 年。

⑧6 宋艳波：《山东地区几个周代墓葬随葬动物分析》，《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5 期。

⑧7 王子今：《秦德公“磔郿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中国文化》1995 年第 2 期。

⑧8 袁靖、石黑直隆：《中日古代家犬的遗传基因比较研究》，《中国文物报》2002 年 12 月 13 日。

⑧9 王劲：《浅议石家河文化陶塑艺术》，《华夏考古》2011 年第 4 期。

⑨1 a. I. A. Silver. (1969). The ageing of domestic animals. In Don Brothwell, Eric Higgs (eds.) *Science in Archaeology: a survey of progress and researc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283~302. b.伊丽莎白·施密德著，李天元译《动物骨骼图谱》，第 42 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 年。c.汤卓炜：《环境考古学》，第 186~189 页，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⑨3 可参考 Nobuo Shigehara. (1994).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Japanese ancient dogs. *Archaeozoologia* (2): 79~94.

⑨4 Marie-Pierre Horard-Herbin. (2000). Dog management and use in the late iron age: the evidence from the Gallic site of Levroux. In Susan Janet Crockford (eds.) *Dogs through time: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England: The Basingstoke Press, pp.115~121.